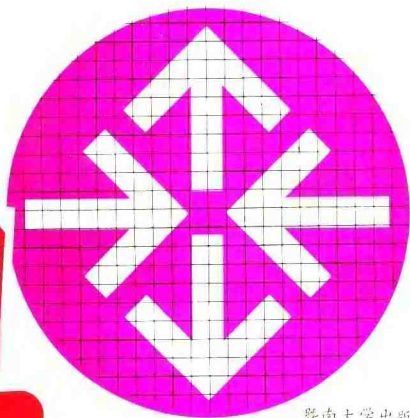


产业经济与贸易重构

S·米克奇 C·费勒尔 著

邓伟根 王燕 译

黄德鸿 校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财 B0001536

产业经济与贸易重构

S. 米克奇 C. 费勒尔 著

邓伟根 王燕 译

黄德鸿 校

395237

F014.6/1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 • 广州

产业经济与贸易重构

S. 米克奇 C. 费勒尔 著

邓伟根 王燕 译

黄德鸿 校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江门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218 字数：8.43 万字 插页：27

印数：1—3000 册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31029—075—4/F·21 定价 2.45 元

译者序

1990年10月，我们刚认识的英国朋友——香港 Higglesfield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法兰克·威廉姆·莱塞尔先生 (Frank William Layzell) ——答应送给我们3本书，很快我们就收到他转来的第1本书，即《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Trad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重新改组产业经济和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为简便起见，我们将书名译为《产业经济与贸易重构》。该书专门研究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问题，它不仅同我们研究的专业方向相吻合，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所进行的经济调整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于是，在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下 (陈云山先生、李国华先生分别完成第二章、第三章的初译工作)，我们很快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并得到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使这本译著能很快地同广大读者见面。

鉴于本书原是一份研究报告，把不少理论分析给抽象掉了，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用一定篇幅对本书涉及的基本问题——政府干预与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失业与通货膨胀、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试图作全面的概述。

本书的主线是政府干预与产业政策问题，究竟如何认识政府干预国民经济以及产业政策的作用呢？为此，我们须对它的来源进行一些回顾。

无论从理论上的确立还是从实践上的实施来看，政府干预国民经济活动的标志是以凯恩斯理论的确立开始的。1936年凯恩斯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不仅是西方

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也是政府较大范围地干预经济的开始。由于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过去单纯认识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为主的经济分析理论无法解释这一严峻现实,更进一步地说,它们无法提供出一套有助于使资产阶级政府摆脱困境的对策措施,凯恩斯理论便应运而生。他通过研究国民收入变动与就业、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关系,推断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地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凯恩斯看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即社会总消费支出和总投资支出不足是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因而,要增加国民收入和扩大就业,只有通过公共投资的办法弥补这种不足,从而开创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河。经济学界把这场经济理论变革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它包括了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以有效需求理论来代替剑桥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调节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凯恩斯在沿袭马歇尔关于均衡价格与均衡关系概念的基础上,来确立他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的论点;但在理论上,凯恩斯则冲破庸俗经济学的传统概念,认为均衡水平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水平。在达到均衡时,如果社会上除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已经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了,这才是充分就业均衡;如果社会上还存在非自愿失业,那就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均衡。因此,是否达到充分均衡,要根据有效需求的大小来决定的。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以及人们“心理上的流动偏好”等因素影响,在通常情况下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一般总存在“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萧条与失业。在我们看来,虽然凯恩斯理论仍然掩盖了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根源,但它毕竟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承认了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

二是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即要求把政府的一个首要任务转为主要以财政政策来控制与刺激有效需求。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非自愿性失业和过度需求造成通货膨胀的论断出发，凯恩斯的政策手段就是通过对有效需求的调节；也是本书所提及过的“需求管理”——才能维持经济稳定：萧条时期反萧条，通胀时期反通胀。凯恩斯正是从他自己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出发，来推断出只有依靠政府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稳定的政策性结论。

应该承认，凯恩斯理论在解决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然而，“凯恩斯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尤其以主观唯心主义心理动机为基础的有效需求理论，显然是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直至70年代中后期，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物价持续上涨、失业和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问题。在这种状况下，50年代和60年代曾取得一定成效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陷入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刺激需求，则会使通胀进一步恶化；如果抑制通胀，则导致生产的进一步萎缩、失业增加。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对凯恩斯主义普遍产生怀疑。其中主张应重视供给的学派认为：“滞胀”是长期的需求管理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刺激需求会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投资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因而应抛弃凯恩斯理论，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要素投入和供给增长；同时竭力反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主张降低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减少赤字，争取预算平衡。他们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多，意味着私人生产性支出的减少，政府的一些福利也起着抑制生产的作用。正如美国的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失业补助增加了失业人数”，因为失业补助降低了失业的相对价格，失业者可以取得净工资的60~75%的救济金，造成自愿失业者增多。

尽管供给学派在 80 年代初对于逐步摆脱“滞胀”的问题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主要论点仍然沿袭了古典经济学派的萨伊定律、自由市场经济均衡论等观点，他们否认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远不如宏观需求理论那样成体系和完善。时至今日，无论凯恩斯主义也好，还是立意融合“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也罢，都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这一现实问题。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体地说是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失业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条件。因此，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扩大财政赤字和制定通货膨胀等手段所能消除的；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投资，扩大需求，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进一步降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购买力。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本书所描述的背景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困境之中，它充分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失败的。同样，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也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困境。很明显，减税仍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使财政危机加剧；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会使银根过紧、经济呆滞，而且还会使不少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的困难中，结果造成失业人数急剧增加，长期下去将导致技术进步速度的减缓，生产率下降。

依我们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无非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当他们感到凯恩斯主义政策不灵时，就提出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而这些办法失效时，他们很可能又搬回战后已实施多年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他们既否定古典

派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当然也不否认其局限性），也不否定政府干预国民经济活动的必要性（但不会很明确），他们试图寻找活跃市场机制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具体条件与办法——产业政策或产业调整政策，旨在跳越凯恩斯主义大而化之的经济干预，把“手”伸进更具体的经济均衡关系与均衡进程当中，通过产业政策或产业调整，来寻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与需求的均衡以及产业部门间的均衡。由此看来，对政府干预的认识主要不在于有无必要的问题，而在于干预的程度及范围。

产业政策尽管成了近一二十年来各国都广泛使用的时髦术语，但迄今为止对产业政策的界定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大体归纳起来有4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对有关产业制定一切政策的总和，认为它“是同产业有关的一切国家的法令和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产业或企业的生产、营业、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市场形成与市场机制的政策总称”；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产业政策是计划，或说是指导性计划，是政府对未来产业结构变动方面的干预；第三种观点认为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所可能造成的失误，而由政府采取的一些补救政策，即“在价格机制下，针对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市场失效而进行的政策性干预”；第四种看法认为产业政策是为了加强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对发达国家而言，产业政策往往是“政府为了取得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打算在国内发展或限制各种产业的有关活动的总概括”，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政策往往是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总称。

本书所提及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产业调整政策，从弥补市场缺陷的角度出发，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品的竞争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加快资源从某一产业部门到另一产业部门的转换，从而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缓和国内失业的压力。

当然，由于各国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它们的政策措施也不尽相同。本书在第六章对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挪威及荷兰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逐一进行分析评价，它反映了这些国家在摆脱70年中期起的经济衰退所作出的努力。其中有些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第一，如何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模式的改变结合起来；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与贸易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处理好经济调整与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发达国家政府在以上方面是作过尝试的，也有不少经验教训，但这些努力充其量只缓和了激化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危机与失业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顽症，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二

就业与失业是经济运行的指示器，也是本书研究主线的另一核心问题。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把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同失业相比较，得出二者之间有一种交替关系：高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低的失业率，低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高的失业率。由于货币工资水平的移动往往是同总的价格水平的变化相一致的，而通胀率往往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因而，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被认为也存在这么一种交替关系：高的通胀率总是伴随着低的失业率，低的通胀率总是伴随着高的失业率。菲利普斯所论证的这种交替关系，成为当时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既然通货膨胀高一点就可以使失业少一点，或说多一点失业就可以降低一点通货膨胀，那么，只要把握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平衡点，二者便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当通胀率超越“警戒”线时，就宁

肯使失业率高一点，把通胀率降下来；当失业率超过“警戒”线时，就宁愿使通胀率提高一点，把失业率降下来。

诚然，70年代中后期的“滞胀”，即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无所适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方面面临着经济衰退威胁，物价上涨，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失业率也不断地年复一年上升，国内面临着更大的失业压力。这种局面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得不去研究和尝试解决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这里结合本书观点讨论3个基本问题：

一是努力降低通货膨胀率。人们普遍不赞成象70年代那样的通胀率，而主张适当地降低价格水平，努力实现价格稳定。然而，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标呢？看法是不一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应通过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来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标；财政主义者则认为，应通过财政政策（政府收支政策）来控制总需求。因此，货币政策的“药方”是“开顶风船”，而财政政策的“药方”是“反周期”。本书作者的观点似乎偏重后者而不是前者，特别是增加政府开支“创造就业”，以进一步缓和国内的失业压力。

二是结构性失业需要结构调整来解决。本书作者认为，70年代中后期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失业。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摩擦性失业是指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地的正常流动中所必然造成的某种失业。简单地说，工人适应工作不可回避地需要时间，而这种寻找时间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失业工人在现存的工资水平条件下没有重新就业所要求的技能，通常由于总需求变化而出现的劳动力重新安置是极其缓慢的，因而，工人之间不完全相互替代，那么就会产生结构性失业。即使总的职业空缺足够重新雇佣所有就业人数，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结构

性失业持续的时间往往较长。由于总需求构成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因而，任何经济社会总有一些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统称自然失业）。本书作者也是持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的必然产物，它比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所引致的就业丧失影响更加严重，也更为普遍。因此，要解决这些失业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甚至进行结构的重组。

三是调整援助计划及失业补贴的效果问题。作者极力主张发达国家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胀率与失业率并存的困境，应加快调整其内部产业结构。然而，也正是“滞胀”的压力，使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偏向于限制而不是扩张。因而，人们往往把调整的政府援助看成是保护主义措施的一种选择，导致调整援助计划收效甚微。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失业补贴也遭受非议。本来，失业补贴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工人免受失业引起的经济困难，但目前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把高失业率归究于失业补贴，认为失业补贴降低了寻找工作的成本，失业工人便延长寻找新工作岗位的时间，从而使失业的数量与时间都增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低失业企业应该不断地补贴高失业企业，资本主义国家又能否在效率准则与社会利益准则上寻求适当平衡点呢？而且，一旦把实施多年的某些福利措施砍下来，会不会引致社会与政治的严重后果呢？这些问题恐怕作者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其原因在于，作者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认识与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

三

国际贸易通常被称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最初的发展是自由贸易。在1854年，英国出口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英国所占份额达40%以上，可以说，当时英国工业产量扩张的销路主要是国外市场。

当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出口在维持需求方面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工业中心国家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1860年后铁路的发展以及1870年后蒸汽轮船的大规模使用所带来的运输费用大幅度下降，当时的出口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李嘉图在《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比较成本原理”或“比较优势原理”正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理论基础。李嘉图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提出了按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的学说。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在于地域自然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商品成本的绝对差异，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即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李嘉图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的商品，然后进行对外贸易交换。这样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即如果各国都出口各自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放弃相对劣势的产品，那么对各国都有利。李嘉图的这一学说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国家为促进进口替代而采取保护措施，发挥了补充出口扩张或比出口扩张更为重要的作用。德国便是大家最熟悉、也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尤其以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为代表。李斯特是在反对自由贸易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他的贸易保护理论的，他指出比较成本理论不利于当时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慢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财富的生产比之财富的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向外国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而会长期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虽然德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开始会使制成品的价格提高，但经过一段时期后，在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

降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低于外国进口商品价格。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扶持幼小产业说”，它对后起国很有意义，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要借助于一定程度的保护。

此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理论争端及其实践交替，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至今仍没有定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危机时代，自由贸易、个人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金本位制度逐渐被各交战国认为只要有利于战争就要采取的控制手段和限制措施所取代。战争对欧洲大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力的破坏，在1929年以后，世界被卷入大萧条的猛烈漩涡之中，随着银行倒闭，债务停付，资本市场枯竭，金本位制被抛弃，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及保护主义盛行，失业率上升到20%、30%甚至更高的水平，企图想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时期水平的梦想也破灭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崩溃再次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所造成的破坏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重。但尽管如此，人们仍没有放弃争取和平与战后发展的信心与希望。就在二战结束前一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两个经济组织以督促新出现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一是旨在处理货币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称世界银行），旨在促进用于重建与发展目的的长期贷款的流动，以取代大危机年代消失的国际资本市场。直至5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全面复兴，开始进入繁荣时代，1958年底，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联合发表了允许货币自由兑换的声明，随后又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改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而使经济恢复正式确定下来。1960~1973年间，世界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约为5.5%，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60年代末，它们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人均增长率在1973年后也开始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球现象，贸易又一次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在1955年至1973年

间，世界贸易量几乎增加了3倍，其中，由于受到区域贸易自由化，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全面削减关税的促进下，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相互交换发展最为迅速。此外，资本流动在推动增长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加速的通货膨胀和石油第一次大幅度涨价的双重压力，使世界经济繁荣在1973年终告结束。实际上，为了对付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工业国家在1973年以前就开始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加上布雷顿森林制度逐步崩溃——1968年起开始实行黄金市场双轨制，1971年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初最终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世界经济在1974年开始进入经济衰退阶段。本书正是以这一时代背景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问题。为此，我们要在简单回顾历史演变进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自1974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变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世界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3%左右。其中，发达国家的下降速度要比发展中国家快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也下降了，出现这样的倒退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

第二个特点是从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了以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经济“滞胀”现象。1975年的衰退是战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衰退，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随后的恢复（1976~1978年）均疲软无力，不足使就业回复到被认为是正常的水平，各国汇率不时有大幅度的波动。发达国家在采取政策措施上左右为难——不知是采纳货币主义政策主张，还是继续采取凯恩斯学派的短期权宜之计为好。

第三个特点是贸易格局日益多样化。在贸易流动中不断出现一些重要变化，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和石油出口已不再是推动世界贸易最有力的因素，它们的作用已被发展中

国家制成品出口，尤其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所取代。尽管工业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⑧，从而更加影响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产品，但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巴西、亚洲四小龙等）仍然成功地增加了对工业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出口。

第四个特点是，劳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差不多占全部贸易总额的 25%。其中，旅游及资本收入是两个最大的项目。

第五个特点是，自 1973 年以来的这一时期，世界上没有一套一致赞同的、能支配国际货币行为的准则（即人们所说的“国际货币无制度”）。各国汇率浮动、黄金价格跌落起伏，国际收支调整的现象不时出现或被推迟，所有这些都没有正式的国际行为准则可以遵循。

第六个特点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 70 年代初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要求同发达国家一样有更加平等的经济地位。1974 年 1 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NIEO），“决心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努力工作”。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初级产品、资源转移及货币等问题上争取了一些权益，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起初为之呼吁变革的权力关系及收入分配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的迹象，国际经济新秩序始终还未确立起来。

由此看来，本书所提出来的 3 个基本观点仍然值得探讨：第一，自由贸易是好是坏，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第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可通过参与贸易来实现利益交换。然而，事实表明，在出口制成品上取得成功的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新兴工业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大量依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世界银行的低收入欠发达国家出口收入的

70%仍然来自初级产品。因而，这种贸易是否真的带来利益，仍然是争取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当然，在货币问题上，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以下3个问题上赢得发达国家的重大让步：建立中期贷款，放宽补偿贷款，出售基金组织的黄金用于建立信托基金；第三，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对保持其经济扩张与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确，发达国家通过结构调整，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去，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恢复经济及缓和国内失业压力起到较大作用，其中有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诸如拟定产业援助计划、制订法律条例来实施援助计划、把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发展协作结合起来等等。

尽管当今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发展前景仍不太明朗，但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构成全球经济，看来是大势所趋。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利益冲突、政治社会摩擦等各种不稳定因素，但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高本身的综合国力，不断地调整结构，企图在世界经济社会体系中寻求更有利的位置。我国在过去的10年改革开放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同样须要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不败之地，这恐怕是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迪。

1991年元月

前 言

1976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了有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进步以及国际分工问题的第三次世界会议,会议发表了《行为准则与计划宣言》,宣言第4条阐明发达国家的积极人力资源及调整援助措施。《行动计划》指出:“为了贯彻实施就业及人力资源政策,发达国家应继续遵循和拓展自由贸易政策,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与半成品进口,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与收入水平,同时以维持发达国家的就业水平。调整援助是适宜的进口限制”。

近年来,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失业以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问题上。

因此,国际劳工处主管机构在第204项决议中(1977年11月),提出要举办《发达国家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增加进行就业结构调整与调整援助的第三次研讨会》的建议。

本研究报告最初是为这一研讨会准备的,研讨会于1978年5月3日至5月在日内瓦举行。这两项费用均由挪威政府资助。本书的目的是让这项研究能公诸于众。